

学术专论

清代伊犁索伦营述要

吴元丰

[摘要] 清朝统一新疆后, 为了加强西北防务和巩固统一, 在天山北部地区设置驻防八旗, 建立起完备的防务体系。伊犁索伦营作为新疆驻防八旗的组成部分, 其构成是多元的, 由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锡伯族兵丁组成, 在军政合一的八旗组织下, 和睦相处, 共同生活, 担负着戍边屯垦的使命, 对巩固新疆的统一, 保持当地社会的稳定, 加强西北边界的防务, 以及发展当地农牧业生产, 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依据满文档案, 并参考相关汉文文献, 就索伦营的设置背景、兵丁来源、建制沿革、生计维系、驻防任务五个方面作一论述。

[关键词] 驻防八旗 索伦营 伊犁 鄂温克族 达斡尔族 锡伯族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2)-02-0058-011

清乾隆年间统一新疆天山南北后, 在天山北部地区设置驻防八旗, 先后设立察哈尔营、索伦营、厄鲁特营、锡伯营、惠远城满营、惠宁城满营、乌鲁木齐满营、巴里坤满营、古城满营、吐鲁番满营, 建立起完备的防务体系。索伦营作为新疆驻防八旗的组成部分, 与其他各营一样, 是军政合一的组织, 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项职能。有关伊犁索伦营的历史, 曾有学者研究并发表过文章,^① 但随着相关满文档案的编译公布和开放利用, 发现目前已有研究成果还不够深入, 有必要进一步探究。本文根据满文档案, 并参考相关汉文文献, 就索伦营的设置背景、兵丁来源、建制沿革、生计维系、驻防任务五个方面作一论述, 以供同好。

一、伊犁索伦营设置背景

清初, 在伊犁驻牧的准噶尔部控制天山南北, 与清廷抗衡。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不懈努力, 清廷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最终统一了新疆天山南北。因长年战争, 天山北部的人口锐减, 土地荒芜, 生产废弃, 防务空虚。在这种严峻形势下, 为了巩固统一局面, 加强西北边疆防务, 清廷决定派兵驻守。起初, 从出征的八旗和绿营官兵内, 抽调派驻天山南北各重

[收稿日期] 2021-06-15

[作者简介] 吴元丰(1956—), 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北京 100031; ambawu@sohu.com

① 吴元丰:《索伦与达斡尔西迁新疆述论》, 吴元丰:《满文档案与历史探究》,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5年, 第284-298页; 李俊梅、高颖:《清代伊犁驻防索伦营考》, 《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佟克力:《清代伊犁驻防索伦营始末》,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镇要地，其中派驻伊犁马兵 1 500 名、绿营兵 2 000 名，马兵负责驻防，绿营兵则负责屯田和筑城。这些派驻伊犁的官兵，并不携带家眷，不是永久性驻兵，按规定每三年换班一次，从内地各省调遣派驻，这既耗费时间，又糜费钱粮，决非长久之计。

清廷从新疆的长治久安考虑，决定选调携眷八旗官兵移驻，由换防兵改为永久性的驻防兵，而且对新疆实施军府制的治理政策，在伊犁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天山南北军政事务。乾隆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乾隆帝发布上谕，正式设立伊犁将军，并以明瑞为首任伊犁将军。^①同时，军机大臣傅恒等遵旨议奏：“自伊犁至乌鲁木齐、巴里坤，凡寻常事务，仍照旧例，由各该地方大臣办理”；“若有兵丁调遣之事，则听将军调遣”；“自喀什噶尔、叶尔羌至哈密所有回城，亦照巴里坤等处之例，驻各城官兵，皆听将军调遣，凡寻常事务，皆照旧例办理”；“又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处，皆地处边陲，回子各城地方，若有应急事件，需要调遣伊犁兵丁，亦准各处办事大臣咨商将军，就近调用伊犁之兵”。^②遂奉旨准行，明确了伊犁将军的职责权限：既是新疆最高军事统帅，同时也是新疆最高行政长官，代表中央政权负责处理新疆的军政事务。

伊犁地处新疆天山北部的西端，与哈萨克、布鲁特等接壤，是通往中亚地区的交通要道。伊犁地理条件也极其优越，水草丰美，宜耕宜牧，曾经是准噶尔汗帐所在地。伊犁将军驻在伊犁河北岸的惠远城，该城也因此成为西北边陲的军事重镇，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新疆都会”。伊犁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地位，居于全新疆之首，需要重兵驻守。为了解决伊犁地区所需驻防兵力，清廷对全国驻防八旗进行调整，甘肃凉州、庄浪驻防八旗满洲、蒙古官兵，全部携眷移驻伊犁；京口、杭州等处驻防八旗汉军全部改编入绿营，其腾出的名额，分别拨给张家口外八旗察哈尔和黑龙江布特哈索伦、达斡尔等，作为八旗兵携眷移驻伊犁。

这次移驻伊犁的八旗兵丁都是永久性驻扎兵丁，与以往的换防兵丁比较，不仅因携带家眷而人口众多，而且来自不同的地区和民族，移驻行程远近不一，生活习俗存在差异，需要办理的事项极其繁杂艰巨，需要全面统筹规划，分期分批有序合理推进。伊犁驻防八旗兵丁的移驻，从乾隆二十七年开始，止于乾隆三十六年，共用了 10 年时间，先后分批移驻的有张家口外察哈尔、黑龙江鄂温克和达斡尔、盛京（辽宁）锡伯，以及甘肃凉州和庄浪、陕西西安和直隶热河满洲、蒙古等兵丁。其中首批移驻的是察哈尔兵丁，其次是鄂温克和达斡尔兵丁，最末一批是西安的满洲和蒙古兵丁。从移驻兵丁的来源来看，伊犁驻防八旗的构成是多元的，有满洲、蒙古、鄂温克、达斡尔、锡伯等民族，而且蒙古族又分八旗蒙古、察哈尔、厄鲁特等，其中八旗满洲、蒙古、锡伯早已成为正规军人，八旗察哈尔，布特哈鄂温克、达斡尔则是移驻伊犁后才成为正规军人，而厄鲁特属新编入的八旗兵。

二、伊犁索伦营兵丁来源

索伦，在清代文献中有两种含义，广义上指黑龙江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狭义上指黑龙江鄂温克族。早先，索伦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地方，后来逐渐南迁至嫩江流域。康熙初年，先设布特哈八旗，后改设布特哈总管衙门，专门管理嫩江流域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布特哈是满语音译，其意为打牲。布特哈总管衙门管辖下的成丁，称打牲丁，平常猎貂进贡，遇有战事也奉调出征。雍正十年（1732），为了加强呼伦贝尔防务，清廷抽调一部分布特哈鄂温克、达斡尔兵丁移驻，编设八旗，设置总管统领，至光绪年间改为副都统。这部分

^① 《军机处满文上谕档》，乾隆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文所引档案均藏该馆），档案号：31-2。

^②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档案号：2864-2。

鄂温克、达斡尔人丁的身份发生变化，由打牲丁变成八旗兵，驻卡巡边，守卫疆土，而留在布特哈的鄂温克和达斡尔等人丁，仍保持其打牲丁的身份，每年照例捕貂纳贡。

乾隆二十二年初，当平定准噶尔战争进入尾声时，有人提议派索伦兵丁移驻伊犁等处地方，乾隆帝没有采纳，并明确指出：“至所议索伦兵丁前往新疆管辖厄鲁特事宜，毋论远道迁移，事属未便，且索伦素属骁勇，若与厄鲁特聚处，势必染其余习，将来渐不可用，甚属无益。”^①然而，到乾隆二十三年初平定准噶尔战争结束时，由于经过两次战争，当地厄鲁特蒙古人口锐减，彻底消除了乾隆帝顾忌的统治隐患，所以他改变初衷，欲派索伦兵丁携眷移驻新疆，特降旨曰：

索伦兵效力军前，屢年未获休息，今贼众渐次剿灭，大功将竣，自可不日撤回。现议在乌鲁木齐、鲁克察克等处屯田，令绿旗兵驻扎，虽娴于耕作，而镇守巡防之用不及索伦，若令索伦兵同驻，似为有益。伊等每年进纳貂皮，今移往驻防，既免其纳赋，又有钱粮养贍，射猎资生，自当更觉饶裕。可传谕绰勒多等，于索伦兵丁内，拣选一千名，明白晓示，以驻防之外，并无别项差遣，且于伊等生计有益。或今年先遣兵丁前往，来年再将伊等眷属移去，料伊等自必情愿。至拣选兵丁时，若户口多者，恐其亲属相离，毋庸派往，惟小户单丁为善。其作何选派及携眷驻防，果否与伊等有益，著绰勒多等定义具奏。^②

在此道谕旨发出后的第二天，乾隆帝又补充降旨曰：

昨谕绰勒多等，拣选索伦兵一千名，驻防乌鲁木齐等处，并将携眷前往之处议奏。特虑伊等两地瞻顾，务使得所之意。今思人情安土重迁，或携眷亦非所愿，且驻防兵丁，亦不妨更番戍守。著传谕绰勒多，体察情形，如不愿携眷，即定以年限，派兵更代，酌量赏贍。^③

这道补发的谕旨说明，此次派遣索伦兵丁携眷移驻新疆并非指令性的，而是要看索伦兵丁的意愿，若不愿意携眷移驻，则作为换防兵派遣，限期更换。经黑龙江将军绰勒多询问获悉，索伦兵丁都不愿意携眷移驻，因而改成换防兵派驻。

索伦本为渔猎民族，善于骑射，骁勇强悍，编入八旗后，成为清朝军队中的劲旅之一。每遇战事，索伦兵都被抽调出征，而且表现勇敢，屡建奇功，久负盛名。伊犁地处西北边陲，且又作为新疆首府所在之地，务必要派驻八旗之劲旅，加强防务力量。乾隆二十八年年年初在筹划伊犁驻兵事宜时，清统治者必然会想到英勇善战的索伦兵丁，所以“令黑龙江将军、察哈尔都统等，从索伦、察哈尔丁内选其情愿携眷迁往伊犁者，索伦一千名，察哈尔一千名，均作为披甲，照先前移驻察哈尔、厄鲁特之例，将内地应得钱粮及出差应得盐菜银均支给，连同凉州、庄浪三千二百名满洲、蒙古兵，共计兵丁五千二百名，俱携眷移驻伊犁”。^④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三日，黑龙江将军国多欢接到挑选布特哈兵丁携眷移驻伊犁的谕旨后，从鄂温克、达斡尔内各挑选兵丁 500 名，共计 1000 名，每 100 人内，拣选 2 人为头目管理，又选派布特哈总管 1 员、副总管 1 员、佐领 10 员、骁骑校 10 员管带前去。这些挑选的官兵分两队迁移，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初十日，第一队的 500 名鄂温克兵，携带家眷 1421 口人，从嫩江流域起程西行，途经漠北蒙古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地方，八月中旬抵达赛音诺颜部乌里雅苏台地方，经短暂休整补给后，八月底起程继续西行。在进入新疆后，伊犁将军明瑞派遣官兵携带米面至额敏河、博罗塔拉等处接济，于乾隆二十九年正月十九日，第一队鄂温克官兵顺利抵达伊犁。乾隆二十八年五月初三日，第二队的 500 名达斡尔兵，携带家眷 1417 口人，从嫩江流域起程西行，经过漠北蒙古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地方，九月下旬抵达赛音诺颜部乌里雅苏台，

① 《清高宗实录》卷 530，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庚子。

② 《清高宗实录》卷 558，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己亥。

③ 《清高宗实录》卷 558，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庚子。

④ 《大学士傅恒等遵旨议奏派一千名察哈尔兵丁携眷移驻伊犁事宜折》，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吴元丰、阿拉腾奥其尔等主编：《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8 页。

在其附近扎巴坎地方扎营过冬。二十九年三月中旬，经补给口粮和牲畜后起程继续西行，取道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地，于七月二十六日，第二队达斡尔官兵也顺利抵达伊犁。这 1000 名鄂温克、达斡尔兵丁到达后，经伊犁将军明瑞奏准，安置在惠远城西北霍尔果斯河东西两岸一带地方，合编为一营，称之为“索伦营”。

在鄂温克、达斡尔兵移驻伊犁后，由于诸多原因，不仅人口繁衍缓慢，而且男丁不断减少，至嘉庆二年（1797）已经没有壮丁补充兵缺，出现了严重的兵源危机。伊犁将军保宁发现，“伊犁索伦营人口增长向来不佳，竟有绝嗣之户，以往挑选披甲，已难得强壮闲散之丁。不料去年传染出痘，该营闲散丁亏损约四百名，现余闲散丁无多，亦俱年幼。是故，今挑选披甲，竟不得年力精壮者。”因此，伊犁将军保宁不得不向嘉庆帝提出建议称：“索伦营兵系一支劲旅，若不稍加调整办理，而以幼丁为兵充数，或致兵数减少，均不成事体。奴才留心细查，近数年来，锡伯营人口甚旺，现堪以披甲之闲散丁颇多。索伦、锡伯俱系东三省之人，风气相近，若锡伯营闲散丁移补索伦营，现即可得强壮之兵，而自幼与索伦合居一处，日久练习，自然俱成壮健之兵。”嘉庆帝采纳此建议批准施行，“于锡伯营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强壮闲散丁内，选出即可挑甲者一百六十户，移至索伦营，按各该牛录闲散丁之多寡，分补挑甲”。^①后因道光初年间索伦营官兵数次奉调赴天山南部参加平叛战争，遭受一定的伤亡，道光十三年（1833）索伦营再度出现了兵源危机。索伦营领队大臣奇成额呈文伊犁将军特依顺保：“本部人口增长向来缓慢，而道光六年、十年派往喀什噶尔出征官兵内，阵亡官兵二百三十余员名。伊等所遗之缺，皆挑取身材较高之闲散、西丹，补充兵额当差。现有闲散、西丹，皆年幼尚未成丁。是故，堪以挑选八旗披甲缺之闲散、西丹，委实不能接续。请仍如前办，由锡伯部再选闲散、西丹一百名，携眷移至索伦部，以备拣选披甲。”^②遂经伊犁将军特依顺保奏准，由锡伯营拣选闲散丁 100 名，连同家眷一并移入索伦营，均匀分至各该牛录。先后两次共选锡伯闲散丁 260 户移入索伦营，从而彻底解决了兵源危机。伊犁索伦营兵由鄂温克、达斡尔、锡伯三个民族共同构成，这在清代伊犁驻防八旗各营中是极其罕见的，具有鲜明的特点。

三、伊犁索伦营建制沿革

八旗是清朝立国安邦的根本制度之一，分为京师八旗和驻防八旗。清入关后，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八旗驻防体系，选择全国各重镇要地派驻八旗兵丁，设置将军统率，至乾隆年间伊犁将军设置时，全国有 14 处驻防将军。从各处驻防将军的具体职掌来看，除盛京、吉林、黑龙江、伊犁 4 处将军外，其他 10 处将军都是纯军事驻防性质的，只管理本驻扎城池或地区的八旗事务，并不干预绿营兵和行政方面事务。而盛京、吉林、黑龙江和伊犁将军则不然，全权负责管理当地的军政事务，但因各地事务有所不同，彼此间仍存在一些差异。特别是在编制方面，比较而言唯有伊犁驻防八旗极为特殊，不像其他地方驻防八旗一样编设旗分佐领后，在将军之下设置副都统、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员管带，而是以相对单一来源的兵丁为单元，按八旗出征兵之例，分别设置察哈尔、索伦、锡伯、厄鲁特、惠远城满洲和惠宁城满洲 6 个营。因惠远城满洲营与将军同在一城而不设领队大臣，只设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管理外，其余各营均设领队大臣、总管、副总管、佐领、防御、骁骑校管理，而各营领队大臣都与将军同驻一城，由总管和副总管负责处理各该营的日常事务。

^① 《伊犁将军保宁奏索伦营闲散壮丁锐减请选调锡伯丁补充折》，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珍藏达斡尔族满汉档案汇编》第 1 册，辽宁民族出版社，2018 年，第 465 页。

^② 《伊犁将军特依顺保奏调锡伯丁补充索伦营兵额折》，道光十三年十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锡伯族档案史料》上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 年，第 615 页。

在鄂温克、达斡尔兵丁移驻伊犁之前，清廷已开始在伊犁河北岸修筑将军所驻城池，并派驻满洲和绿营换防兵，移驻一部分携眷察哈尔蒙古兵，收编留居伊犁的厄鲁特蒙古披甲当差。第一队鄂温克兵丁抵达后，就安置在伊犁河迤北霍尔果斯河迤西沙玛尔、齐齐罕、土尔根、撒橘等地；第二队达斡尔兵丁抵达后，就安置在霍尔果斯河迤东克阿里木图、霍尔果斯、富斯克等地。同时，所有 1000 名鄂温克、达斡尔兵丁，不按八旗之颜色，均匀编为 6 个牛录，其中鄂温克 3 个牛录、达斡尔 3 个牛录，分为左右两翼，统称索伦营，设置领队大臣 1 员、总管 1 员、副总管 1 员、佐领 6 员、骁骑校 6 员，负责管理营务。^①

乾隆三十二年，由于伊犁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各营生齿日繁，官差增多，原有官员已不敷当差管理。于是，伊犁将军阿桂奏称：“移驻伊犁之索伦、锡伯、察哈尔，按新厄鲁特之例，编设牛录，故不论旗分，曾以近二百户为一牛录，每部各设六牛录。今生齿日繁，一切差使等项而又烦冗，如仍旧责成六牛录官员管理，实属不足。再两翼厄鲁特中，右翼人众，且陆续来归之厄鲁特，较前亦多。将此只责成六牛录官员管束，则亦不足。明瑞朝觐时奏厄鲁特足够增添二牛录，奉旨准行。因而，除照办外，锡伯、索伦、察哈尔等三部，亦同厄鲁特部，请增添二牛录，俱整编为八牛录，以为八旗。”“又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牛录，既已各为八旗，其旗纛颜色，亦应按旗授之。”“原有左右翼（即厄鲁特——引者注）总管关防，锡伯、索伦、察哈尔总管关防及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佐领钤记（当作图记——引者）所铸字样，均已不合。应照现今整办之例，标明旗色，改铸颁发。”^② 奉旨准行。此次整编未增加兵数，将原有的 1000 名兵丁，分编八旗，每旗各设 1 牛录，除原有总管 1 员、副总管 1 员、佐领 6 员、骁骑校 6 员外，增设佐领 2 员、骁骑校 2 员，并从披甲内选取领催 8 名，连同原有领催 24 名，共计 32 名，每牛录各为领催 4 名、披甲 121 名。在此基础上，颁发了新的总管关防和佐领图记，以及镶黄、正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八种颜色式样的旗。不久，因管理卡伦事务的需要，“于伊犁索伦、达斡尔内，视其效力奋勉、知晓卡伦事宜者，陆续拣选九名，给戴六品空蓝翎，轮驻卡伦”。^③ 至此，伊犁索伦营的建制基本确立。

此后，索伦营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在保持原有 8 个牛录及每牛录各为一旗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变动。乾隆五十六年，添设养育兵 200 名、前锋 40 名，从前锋内选设前锋校 4 名。乾隆五十七年，每旗各设委官 2 员、空金顶 8 名。道光八年（1828）平定张格尔之乱后，办理善后事宜，为了进一步加强新疆地区的防务力量，经钦差大臣那彦成建议，由军机大臣长龄奏准，索伦营增添披甲 100 名，并于左右两翼各设防御 1 员，专管前锋。由此索伦营的建制更加完善，兵力进一步加强，并最终确立下来。营下分设八旗，每旗各设 1 牛录，设有领队大臣 1 员、总管 1 员、副总管 1 员、佐领 8 员、防御 2 员、骁骑校 8 员、委官 8 员、空金顶 8 员、空蓝翎 9 员、委笔帖式 2 员、前锋校 4 员、前锋 36 名、领催 32 名、披甲 1038 名。^④

同治年间，伊犁地区发生动乱，俄国乘机入侵伊犁，割占霍尔果斯河迤西索伦营兵丁驻牧的地区，一部分索伦营兵丁被迫携眷迁到塔尔巴哈台。光绪八年（1882）清朝收复伊犁后，在塔尔巴哈台的索伦营兵丁有部分回到伊犁，被编入刚刚恢复的索伦营，留在塔尔巴哈台的索伦营兵丁则被编入当地的新满营。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但索伦营制仍然保留，1938 年

① 《伊犁将军阿桂奏察哈尔等营添设牛录并颁发旗纛折》，乾隆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第 114 页。

② 《伊犁将军阿桂奏察哈尔等营添设牛录并颁发旗纛折》，乾隆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第 114 页。

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舒赫德等奏，档案号：2481-030。

④ 《伊犁将军保宁等奏添设伊犁索伦达斡尔养育兵并挑取前锋支給钱粮折》，乾隆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宫珍藏达斡尔族满汉档案汇编》中册，第 1221 页；《伊犁将军德英阿等奏锡伯部添设防御前锋折》，道光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锡伯族档案史料》上册，第 328 页；道光朝《钦定新疆图志》卷 5，第 13 页。

才被废除。今新疆伊犁霍城市和塔城地区的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锡伯族就是清代伊犁索伦营兵丁的后裔。

四、伊犁索伦营生计维系

伊犁索伦营的鄂温克、达斡尔兵丁，原在黑龙江时，虽然编入布特哈八旗管理，但并非正规的八旗兵，属于“打牲丁”，日常从事贡貂差使。起初不领取钱粮，后来因其生计困难，特发给 2000 份钱粮，然每份都不是全额钱粮，而是半额钱粮。移驻伊犁后，他们的身份发生变化，成为永久性驻防八旗兵，承担守卫疆土的任务，因而由官方筹划安排其生计。

早在起程移驻时，黑龙江将军国多欢就遵旨向他们承诺：“现若移驻伊犁，则可获全额钱粮、盐菜银，又赏给立业牲畜及整装等项。”^①同时，又按照军机处奏定的办法，发给移驻所需的银两、牲畜和物品，保证顺利到达目的地。选派移驻的总管、委营总、佐领、骁骑校 22 员，按其职级各发一年俸银，共银 1 885 两；兵丁 1000 户，每户各给赏银 30 两，共银 30 000 两；兵丁每人各赏置办兵器银 10 两，共银 10 000 两；官员、兵丁及其家眷，共拨给马 2 998 匹，按每匹折价银 8 两计，共银 23 984 两；每户各给驼 1 只，应给驼 1000 只，按每只折价银 18 两计，共银 18 000 两；每户各给帐房 1 顶、锅 1 口，应给帐房 1 000 顶、锅 1000 口，按每顶帐房折价银 4 两、每口锅折价银 2 两计，共银 6 000 两；官员、兵丁及其跟役，按其级别和身份，共发盐菜银 93 229 两；所有家眷人口，按其大小，各发两个月口粮，共粮 1 352 石余。^②这样按其级别和人员身份发给的物资，不仅能够供给迁移途中的所需，而且有些物资到达目的地后仍可以继续使用，有利于其生计。

为了妥善安排索伦营兵丁的生活，经伊犁将军明瑞奏请，军机大臣傅恒遵旨议奏：“携眷移驻伊犁之二千名索伦、察哈尔兵初到伊犁，尚不习惯，若仅给钱粮而不给盐菜银，于其生计不利。伊等与去年移驻伊犁之八百名察哈尔兵相同，理合与伊等一体办理。自此二千名索伦、察哈尔兵抵达伊犁之日始，一年内支給盐菜银，期满一年后，即行停发，只给钱粮，并种地所需籽种，尽量赏给。收获前所需口粮，分别大小人口，大口每日为八合三勺，小口减半，期满一年后，一并停发口粮。”^③在鄂温克、达斡尔兵丁移驻之初，为防止其生活发生困难，采取了适当的优惠措施，除支給额定的饷银外，按照出征行军和当差外出之例，还发给盐菜银和口粮，而且口粮的发放包括所有人口。经过 25 年后，索伦营人口繁衍增加，原有俸饷银已不敷供养，需要酌情办理，以便维持其生计。乾隆五十六年，乾隆帝特降旨：“伊犁索伦、达斡尔营兵丁移驻以来，一切差使均极奋勉，且于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换防差务，皆甚得力。惟近几年生齿日繁，每月所食一两饷银，难免不敷供养。著加恩伊犁索伦、达斡尔兵丁，每月各赏食二两饷银，并添设养育兵三百名，每月给食饷银一两。”^④将军保宁接奉此旨后，立即据实奏请变通办理，遂允准除领催、披甲每月原食饷银 1 两外，各增加饷银 1 两，共计 2 两；所拨 300 份养育兵钱粮，添设养育兵 200 名，每月给食饷银 1 两，其余 100 名养育兵之额，添设前锋 40 名，每月给食饷银 2 两 5 钱。至此，每年应发俸饷银相对固定下来，即索伦营官兵估需俸饷银 26071 两，其中总管俸银 130 两、副总管俸银 105 两、佐领俸银 105 两、骁骑校俸银 60 两、轮驻卡伦空蓝翎盐

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档案号：1763-1。

② 《黑龙江将军国多欢等奏报拨给携眷移驻伊犁索伦达斡尔官兵盐菜银口粮等项数目折》，乾隆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清宫珍藏达斡尔族满汉档案汇编》中册，第 962 页。

③ 《大学士傅恒等议奏明瑞等所奏筹办安置续迁察哈尔官兵事宜折》，乾隆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第 43 页。

④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保宁奏，档案号：3337-015。

菜银 10 两、笔帖式盐菜银 36 两、领催钱粮银 36 两、前锋钱粮银 30 两、披甲钱粮银 24 两、养育兵钱粮银 12 两。^①

特设滋生银收取利息，除供养鳏寡孤独者外，还借给官兵应急之用。在移驻之初，有官方支拨的一年盐菜银，并未全部发给兵丁，酌量扣留存库，以备应急之用。后来又作为本金贷给商人滋生，所获息银专门供养鳏寡孤独者。乾隆五十三年，伊犁将军保宁将所有 4000 两本银，饬交本地同知庄肇奎，每月每两收取息银 9 厘，赡养索伦营鳏寡孤独者。从乾隆五十六年增加兵丁饷银和添设养育兵后，索伦营兵丁生计逐渐得以改善，需要供养和接济者减少，每年收取的息银都有所剩余，至乾隆六十年已累积 9 000 两。保宁具奏：“索伦营红白事及所有承应官差、派往换防等处官兵，于置办衣物等项整装时，惟因无接济之项，当遇到差使后，不免为难。是故，经与索伦营领队大臣霍硕额商议，由此一千九百两银内，计其足敷使用，永久留给该营九百两，酌定数额，凡遇此等事时借给，不收取利息，勒限一年，陆续坐扣其饷银填补原项，仍继续借给伊等。其余银一千两，亦饬交抚民同知，仍照前例交给商人滋生，每月每两收取息银九厘。俟此项息银又累积达一千两后，亦照此办理，仍令每年借支及坐扣银两年终详细禀报，由卑职饬交粮饷处核查。请将此作为定例，永久遵行。”^② 奉旨允准，从而索伦营滋生银的管理和使用更加完善规范，确保鳏寡孤独者的供养和兵丁的应急借用。

索伦营官兵的俸饷银是额定而有限的，要想增加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难以按索伦营的实际需求随时增加，从未来人口发展和生活需求出发，必须要谋划长久之策。伊犁地区山川纵横，水草充足，适宜放牧，加之鄂温克人习惯于游牧兼渔猎的生活方式，而达斡尔人则习惯于农耕兼渔猎的生活方式，原计划一次性发给立业牲畜，牧放繁殖，补给生活。后因所需牲畜数量巨大无法解决，只好酌情变通办理，将官牧厂的孳生牲畜拨给牧放，按一定比例分配，以利于其生计。起初，鄂温克兵丁牧放的马 1 000 匹、牛 274 只、羊 12 975 只，达斡尔兵丁牧放的牛 276 只、羊 13 025 只。这些数目并非常数，历年都有所变化。按孳生牲畜管理办法规定，孳生马“三年一均齐，每三年本马三匹取孳一匹”；^③ 孳生牛“四年一均齐，每四年本牛十只取孳八只”；^④ 孳生羊“一年一均齐，每一年本羊十只取孳三只”。^⑤ 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伊犁将军明瑞查看发现，“索伦等经常游牧，接近蒙古之生活习惯，仍可放牧。达斡尔等原先务农屯居，尚会牧放马牛，竟不会牧放羊只孳生”，^⑥ 致使孳生羊倒毙。经奏准后，将达斡尔兵丁所剩 7232 只羊都交给索伦兵丁牧放。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新任伊犁将军阿桂又发现，索伦等“耕种私田，牧放孳生及私有牲畜，官差不少，其驻牧之地，又系贸易哈萨克来往大道所在，较其他营多需看护之人，且索伦等在原籍时，养羊者少，不甚会牧放孳生”。^⑦ 遂经奏准，将其牧放的 10 632 只羊都移交厄鲁特营牧放。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索伦营领队大臣都尔嘉呈文将军曰：“索伦等原牧放孳生马一千匹，陆续孳生马驹二百九十六匹，亦添给牧放孳生，又牧放私有牲畜，地方狭小，草场不佳，且去冬雪大，气候寒冷，牲畜倒毙甚众。本年应交孳生儿骡马驹数目不足，经各自尽力办理照数交纳。此项孳生马匹，若仍留给伊等牧放孳生，庶乎与其生计及官牧厂孳生均无益处。”^⑧ 所以，又经伊犁将军舒赫德奏准，将索伦营牧放的 1296 匹马分别移交给察哈尔和厄鲁特营牧放。乾隆五十四年，因索伦营兵丁官差繁多，再无暇牧放仅剩下的 1600 余只牛，经将军保

①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 8，武英殿刻本，第 16 页。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六十年正月二十八日保宁奏，档案号：3493-022。

③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 10，第 3 页。

④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 10，第 4 页。

⑤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 10，第 5 页。

⑥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初二日明瑞等奏，档案号：2181-054。

⑦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四日阿桂等奏，档案号：2272-011。

⑧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二十日舒赫德等奏，档案号：2519-009。

宁奏准，全部抽出分交察哈尔营、厄鲁特营和屯田“回子”等牧放。索伦营兵丁虽然不牧放官牧厂孳生牲畜，但仍有私人牲畜牧放繁殖，成为其谋生的途径之一。

伊犁满洲二营既有饷银，又有口粮，而“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除照例支給饷银外，所有口粮俱系自耕自食”。^①乾隆二十九年年初，伊犁将军明瑞奏称：“索伦等移驻伊犁，其生计多半依靠种田及狩猎。今伊等抵达时，正值种田之际，令其妥善垦种，可及早得利，以便供给。故奴才等留有其承应官差、出行狩猎、牧放孳生官畜之时间，并计其耕作能力及足够食用，每户各拨给耕地八亩。又按其食用之喜好，由仓存粮石内，动支小麦五十石、青稞五十石、黍子一百五十石，作为籽种，按原先所奏赏给。”^②这就说明，第一队鄂温克兵抵达伊犁的第一年，就开始开垦种田。第二队达斡尔兵于七月底到达伊犁，已过播种季节，从第二年起，照第一队索伦兵之例开垦种田。按每户耕种8亩计，索伦营兵丁一年共种8000亩地。另外，还允许索伦营兵丁按其所能多种地。乾隆三十一年二月，锡伯营和索伦营领队大臣给将军呈文称：“今锡伯、索伦兵习耕此处地亩，若只种官给五百石籽种，尚未熟悉此处地亩情形，间或不能丰收，其食粮即致绝断。除官给额定籽种外，再尽力稍加多种，收成幸佳，其食不完者，于冬日饲养消瘦之马、卖而购置应补之畜皆有裨益。即使收成平常，因所耕有余，无论如何不碍食粮。请由官借给锡伯兵青稞四百石，索伦兵麦子、青稞、黍合五百石。所借之粮，俟秋收后，照前回子等所借之例，每石利息一斗，本脚（当作本息——引者注）一并交纳。”^③遂经将军明瑞等奏准，“借给锡伯兵青稞四百石，索伦兵麦子三百石、青稞一百石、黍一百石”，并令各该领队大臣、总管等官员督促兵丁按时开垦播种，妥加管理，以期丰收。^④索伦营耕种所获的粮石都不交公，全部归本营支配食用。

索伦营兵丁平常乘闲狩猎补给生活外，在遭灾欠收时还打猎自救，而且得到官方的支持和鼓励。乾隆三十一年，因遭受蝗灾，粮食欠收，由官方组织打猎救济。时任伊犁将军明瑞奏称：“本年锡伯、索伦兵所种之田受蝗灾较重，若趁秋季兽肥，多派能手行猎，则于接济口粮稍有裨益。惟伊犁地方野兽之性，凡山兽多在大山深处险峻之地，戈壁之兽行于旷野。除撒大围捕杀外，少数人难以用弓箭捕杀，务由鸟枪手搜捕袭杀，方可有所收获。锡伯兵原先来时，虽未带官枪，但所带私枪尚足以彼等行猎。索伦兵既无官枪，私带枪者亦寥寥无几。是以，现由在库旧存前由阿克苏、库车等处所送之枪内，借给索伦昂吉（即指营——引者注）一百枝。惟现在此处，火药一项颇难私得。若误过打猎之季，实为可惜。”所以，未经奏准立即通融办理，“由官存火药内，得（当作拨——引者注）给锡伯鸟枪手共五十斤，索伦等一百斤”。同时，奏请“一千名索伦兵既无枪支，可否将现在借给之枪一百支，即留给该昂吉之兵以备应急，平时持之行猎，以利于彼等行粮”。乾隆帝在明瑞的奏折上用满文朱笔批示：“sain. saha.”（此为转写——引者注）汉译“好。知道了”。^⑤这标志明瑞的奏请得到批准，从此索伦营兵丁就有鸟枪，除应急备用外，平时还可以持枪狩猎，保障打猎的收获和生计的补给。

五、伊犁索伦营驻防任务

设置伊犁驻防八旗的根本目的是加强本地区乃至整个新疆的防务，务必要布防合理，确保防务安全。伊犁地处西北边陲，“至于境外，自北而西则有哈萨克，自西而南则有布鲁特，壤

①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8，第3页。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九年二月初九日明瑞奏，档案号：2073-036。

③ 《伊犁将军明瑞等奏锡伯官兵借种增垦地亩折》，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锡伯族档案史料》下册，第605页。

④ 《伊犁将军明瑞等奏锡伯官兵借种增垦地亩折》，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锡伯族档案史料》下册，第605页。

⑤ 《伊犁将军明瑞奏请狩猎济食折》，乾隆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锡伯族档案史料》下册，第605页。

界毗连”，^①驻防任务极为艰巨繁重。伊犁的驻防八旗，由惠远城满洲营、惠宁城满洲营、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组成，而惠远城满营和惠宁城满营处于核心地位。惠远城和惠宁城都修筑在伊犁河北岸，一西一东，相距70里，伊犁将军驻惠远城。以惠远城为中心，“东北则有察哈尔，西北则有索伦，西南则有锡伯，自西南至东南则有厄鲁特，四营环处，各有分地”。^②除锡伯营筑城而驻外，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都游牧而驻，但都有规定的防区和任务。

其一，驻守卡伦。卡伦是满语音译，其意为哨卡、哨所。卡伦之设，对外防范侵扰，对内查禁偷盗、稽查逃犯，看护屯所和牧场。卡伦有常设、移设、添撤之分，“历年不移而设有定地者，是谓常设之卡伦”；“住卡官兵有时在此处安设，有时移向彼处，或春秋两季递移，或春冬两季递移，或春夏秋三季递移者，是谓移设之卡伦”；“其地虽有卡伦，而有时安设，过时则撤者，是谓添撤之卡伦”。^③索伦营驻牧之地，毗连哈萨克游牧地界，设有常设卡伦和添撤卡伦，共有10座，没有移设卡伦。其中常设卡伦6座，分别为霍尔果斯，卡伦侍卫1员，索伦营官1员、兵20名，厄鲁特营兵5名，共驻37人；齐齐罕，卡伦侍卫1员，索伦营官1员、兵15名，厄鲁特营兵5名，共驻22人；奎屯，卡伦侍卫1员、索伦营官1员、兵15名，厄鲁特营兵5名，共驻22人；博罗呼济尔，卡伦侍卫1员，索伦营官1员、兵20名，厄鲁特营兵10名，夏秋添惠远城满营官1员、前锋5名，索伦营兵10名，共驻48人；崆郭罗鄂伦，卡伦侍卫1员，索伦营官1员、兵25名，厄鲁特营兵10名，共驻37人；辉发，卡伦侍卫1员，索伦营官1员、兵20名，厄鲁特营兵5名，共驻27人。添撤卡伦有4座，分别为旧霍尔果斯安达拉，春季添冬季撤，索伦营官2员、兵30名，共驻32人；齐齐罕安达拉，春季添冬季撤，索伦营官2员、兵15名，共驻17人；河岸，冬季添夏季撤，伊犁河结冰后，与南岸锡伯营所辖沙喇托罗海卡伦合走开齐，索伦营官1员、兵20名，共驻21人；奎屯色沁，冬季添夏季撤，索伦营官1员、兵20名，共驻21人。^④在以上10座卡伦中，索伦营独立驻守的卡伦3座，与惠远城满营合驻的卡伦1座，与厄鲁特营合驻的卡伦6座，与锡伯营卡伦“合走开齐”1处，每年派驻卡伦官兵共计274人。按规定领队大臣每年春秋两季各巡查所属卡伦一次，每两座相邻的卡伦定期派兵巡逻会哨，称之为“开齐”，相互通报情况，若有情况，或当即处置，或逐级禀报。

其二，巡查哈萨克、布鲁特边界（指与清朝接壤的边界）。伊犁接壤的“哈萨克游牧，自西而北，过塔尔巴哈台，直接科布多交界”。^⑤每年秋季伊犁将军派遣领队大臣1员，率领各营所派官兵300名，其中索伦营官兵50余名，巡查哈萨克边界一次。从伊犁起程后，“于沿途有兽之处率官兵练习打猎，妥善指教一切出外之道，严加约束官兵，毋于哈萨克游牧内招致事端，巡查库库乌苏、哈拉塔勒等处，至勒布什后，会塔尔巴哈台所派征收官赋之官兵，各自分地照例征收官赋”，^⑥而后由原路返回，需要月余时间。在巡边过程中所征的“官赋”，是指允许进入卡伦内越冬哈萨克交纳的“租马”，或称“马税”“马租”。“布鲁特边界远在西南哈尔齐喇卡伦以外，越善塔斯太、毕勒哈图等山，行数百里，始见其游牧之人，至特穆尔图淖尔两岸，间有布鲁特所种田地。”^⑦每两年春季伊犁将军派遣领队大臣1员，率领各营所派官兵300名，其中索伦营官兵也有50余名，巡查布鲁特边界一次。从伊犁起程后，沿途一边巡查边界，一边狩猎演

①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11，第1页。

②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11，第1页。

③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11，第2页。

④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11，第11页。

⑤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7，第3页。

⑥ 《伊犁将军庆祥奏派出锡伯官兵等巡查哈萨克边界折》，道光三年七月二十二日，《锡伯族档案史料》，第570页。

⑦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7，第3页。

练，行至穆尔图淖尔后，由原路返回，需要近两个月时间。伊犁巡边官兵每当接近其游牧地界时，临近布鲁特部落首领率人前来迎见，进献“伯勒克马”，而后领队大臣设宴款待，酬赏绸缎等物。^①在双方会见结束后，布鲁特部落首领派专人陪同当向导，查看布鲁特人是否擅自越界放牧和开垦种田，若发现违禁者，则立即驱逐。

其三，塔尔巴哈台换防。塔尔巴哈台地处新疆天山北部，西南与伊犁接壤，是通往阿尔泰、科布多等地的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乾隆二十九年，在塔尔巴哈台地方修城，设参赞大臣1员，选派京城八旗和黑龙江索伦等官兵驻守。自乾隆三十一年开始，由伊犁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营选派1300名兵换防，其中满洲兵550名、锡伯兵150名、索伦兵100名、察哈尔兵200名、厄鲁特兵300名，酌派官员管带。在这些换防官兵内，满洲营、锡伯营官兵驻防二年，每年按新旧之班，于青草长出时更换一半，而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官兵驻防一年，期满一年后就全部换班。嘉庆十二年（1807），经伊犁将军松筠具奏调整后，各营派出的官兵数目如下：惠远城满营协领1员、佐领2员、防御2员、骁骑校4员、兵415名；惠宁城满营佐领2员、防御1员、骁骑校3员、兵305名，锡伯营佐领1员、骁骑校1员、兵130名，索伦营骁骑校1员、兵130名，察哈尔营佐领1员、骁骑校1员、兵160名，厄鲁特营佐领1员、骁骑校1员、兵160名。共计官22员、兵1300名。^②此数并非一成不变，随着驻防形势的变化，还是有所调整的，但变化不大。各营赴塔尔巴哈台换防的官兵，按规定重新编制后，才起程前往。其派出的官兵，“每一百兵为一甲喇；满洲、锡伯兵每甲喇派佐领以下实职官二员；索伦、察哈尔昂吉每甲喇派实职官一员；左翼厄鲁特昂吉每甲喇派实职官二员；每一甲喇由实职官员内委任参领一员，俾其统兵；有一名实职官员之甲喇，由领催内委任骁骑校一员，协助带兵；由协领以下、佐领以上官员内派出二、三员委任营长，总统诸事”。^③塔尔巴哈台的换防官兵，除驻守城池外，还分驻该地所设29座卡伦，巡查边境，以及承应其他临时性官差。

其四，喀什噶尔换防。喀什噶尔是新疆天山南部重镇，是中西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乾隆二十五年，设置参赞大臣1员，总理天山南部军政事务，并派西安、京城八旗官兵驻守。自乾隆三十六年始，改由伊犁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等营选派官兵换防。喀什噶尔的换防官兵，两年换班一次，每年换防一半。各营换防官兵的数额，随着天山南部地区形势的变化，不时发生变化。起初曾有一段时间，停止选派索伦营和察哈尔营官兵，只选派满洲营和锡伯营官兵。至嘉庆年间，又开始选派索伦营官兵。此时各营派出的官兵数目如下：惠远城满营佐领1员、前锋校2员、委笔帖式1名、小旗4名、前锋24名、领催4名、兵35名，惠宁城满营防御1员、前锋校1员、小旗1名、前锋8名、领催2名、兵18名，锡伯营佐领1员、骁骑校1员、领催4名、兵96名，索伦营佐领1员、骁骑校1员、领催4名、兵96名。共计官10员、兵296名。^④这些赴喀什噶尔换防的各营官兵，按规定重新编制后，才起程前往。其派出的官兵，“每一百兵为一甲喇；每满洲甲喇，由佐领、防御内委任参领一员统领，又派骁骑校一员协助；索伦、锡伯、察哈尔部派实职官一员，委任参领，俾其统兵，并由领催内拣选优良者一名，委任骁骑校，协助统兵；统兵所需营长，酌量兵数，于协领、总管以下、佐领以上官员内，拣选善于管束者一员，委任营长，总统诸事”。^⑤喀什噶尔的换防官兵，除驻守城池外，还分驻该地所设18座卡伦，巡查边境，以及承应其他临时性官差。

索伦营官兵除承担驻守卡伦、巡查边界和换防城池等日常防务外，凡遇有战事都奉调出征，

① 《伊犁将军特依顺保奏派出锡伯等官兵巡查布鲁特边界折》，道光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锡伯族档案史料》，第571页。

②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5，第28页。

③ 《大学士傅恒等议奏雅尔换防事宜折》，乾隆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锡伯族档案史料》，第535页。

④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5，第30页。

⑤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喀什噶尔等城换防定例折》，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锡伯族档案史料》，第547页。

与其他各营官兵一起，共同抵御外侵和平息内乱。道光六年，逃亡浩罕的大和卓次孙张格尔率兵侵占喀什噶尔、叶尔羌等4城，索伦营副总管哈丹保奉命率兵出征，建立赫赫战功，赏赐达哈逊巴图鲁名号，画像入紫光阁。道光十年，逃亡在浩罕的大和卓长孙玉素普入侵喀什噶尔等城，伊犁索伦、满洲、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各营共派官30员、兵2000名，远赴天山南部征战。同治四年（1865），浩罕军官阿古柏率兵入侵天山南部，伊犁索伦、满洲、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各营又共同派兵抵御。光绪二年，左宗棠督军收复新疆时，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等营军民积极响应，纷纷赴前线作战。

总之，伊犁索伦营的构成是多元的，由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锡伯族兵丁共同组成，在军政合一的八旗组织下，和睦相处，共同生活，担负着戍边屯垦的使命，为巩固新疆的统一，保持当地社会的稳定，加强西北边界的防务力量，抵御外来入侵，以及发展当地农牧业生产，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ferences

Li Junmin & Gao Yin: "Qingdai yili zhufang suolun ying kao" (On the Solun battalion in Qing Ili). *Xinjiang zhiye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Xinjia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4 (2002).

Tong Keli. "Qingdai yili zhufang suolun ying shimo" (On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suolun battalion garrisoned at Ili in the Qing dynasty). *Xinjiang daxue xuebao (zhexue·renwen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1 (2006).

Wu Yuanfeng. "Suolun yu dawoer xiqian xinjiang shulun" (On Suolun and Daur's westward migration to Xinjiang). In Wu Yuanfeng. *Manwen dang'an yu lishi yanjiu* (Manchu Archives and Historical Studies). Shenyang: Liaoning renmin chubanshe, 2015.

Review of the Solun Battalion of Ili in the Qing Dynasty

WU Yuanfeng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ambawu@sohu.com)

Abstract: After the Qing Dynasty integrated Xinjiang into the empire, the eight banners garrison was set up in the northern Tianshan Mountain and an adequate military system was established to strengthen the defense of Northwest China and to consolidate the unification of the territory. As one component of the garrison of eight banners in Xinjiang, the composition of the Ili Solun Battalion was diverse and it included the soldiers of Daur, Ewenki and Sibo. Under combined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the soldiers lived together and got along with each other. Border garrison and wasteland reclamation were their missions. The Solun Battalion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consolidating the unity of Xinjiang, maintaining local social stability, strengthening the defense of Northwest border and developing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Based on Manchu archives and relevant Chinese documents, this article address five issues, including the contex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lun Battalion, the source of the soldiers,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history, the livelihood of the troops, and the mission of the garrison.

Keywords: the garrison of eight banners, Solun battalion, Ili, Ewenki, Daur, Sibo